

当代中国的 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DANGDAI ZHONGGUO DE ZHISHI GANJUE YU GUANNIAN GANJUE

贺照田 著

2

对当代知识品格与观念品格的省察，

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作为一位深深卷入当代复杂的知识思想状况中的参与者，

贺照田通过自己对知识问题的独特思考，

以史学的方式不仅批判性地整理了当代知识和观念状况，

而且还借着自己赋予史学的价值重建的任务，

尝试对当代史乃至百年中国史给出极富建设性的叙述和理解。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思想的总结，

写作和思考关涉到了与当代中国现实有关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

阅读本书可以充分感受到思想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力量。

B2-53

6

当代中国的 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DANGDAI ZHONGGUO DE ZHISHI GANJUE YU GUANNIAN GANJUE

贺照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贺照田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5633-5841-2

I. 当... II. 贺...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6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675mm×970mm 1/16

印张:21.75 字数:28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2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序一

方法作为救赎

——序贺照田先生的《当代中国的
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一 历史之重与深

稍加阅读,任何读者就会立刻察觉出这本集子后头立着的是一个承担得非常重的心灵。不难想像,不少读者或许会犹如趋乐避苦般地趋轻避重,稍与沉重交接,就放弃了继续与这个心灵对话的尝试。

得要更努力的阅读,读者才会发现,这个心灵并不是西绪福斯,悲剧性地永恒负重而行,那太西方了。眼前的这个负重者则是相信他所背负的包袱,不是压垮人的重量,而是解放的契机。这本集子里的写作则以其繁复的申论以及困勉的文风,寓言式地自我展示一个真理:逃脱历史所积累的困局没有直通车,只有深切地面对、进入、理解、掌握历史的困局或困局的历史这一条路。

作者贺照田先生所承担、所面对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呢?那是一个大局面,是传统中国解体以来,以“现代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为主要标志的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大陆的历史。不避其大、不逃其重地关心中国这个民族的现下与未来,以此为目标、为承担,跃身于过去,是包括贺照田在内的几位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令人印象深刻之所在。大格局的叙事不该被政治正确地钉在耻辱柱上——如果它的肌理

纹路深刻缠绕于真实问题之上。我们反对的大叙事是历史纹路松弛,没有现实经验作底的抽象概念之网。

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间在台湾成长的人们而言,对这个“大”,还是有些体会的,毕竟那时候的历史心灵是和中国的近现代史紧紧贴连着的。曾几何时,这个对“大”的感觉被污名化了,在政治所领导的范围内如此,在我身处的进步学术圈内也是如此,对前者而言,这是“中国认同”,对后者而言,这是“国族叙事”需要被断碎化或主体多元化。但是,只要是对未来还抱有期望,以及还愿意有所承担的读者——不管你承担的是“台湾”或是某一分疏的社会群体——我都建议您和这本集子的思考进行对话。原因无他,毕竟,任何对社会的介入或改造不可能不依托于某种对历史的理解。那么,我们是否不能回避自问:我们对造成我们今天的困局的历史形成机制理解得够深入吗?还是我们所依赖的是一为某种仓促的现实目标所仓促定制的“直观笼统的历史认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重大缺陷,那我们又如何能对我们所处的现实有正确且深入的认识,那,我们又如何能确保我们在作艰困的历史选择时,有足够的现实感?

质言之,为了未来,我们要搞清楚现实与历史,而这是要讲求方法的。这个核心关怀,是贺照田先生再三致意之所在。为了方便以下的介绍性申论,不待作者同意,我冒昧地以“方法作为救赎”指称作者这一核心关怀与思路。这里的“方法”是一泛称,约略指的是主体面对历史与现实,以及主体之间进行争议时所应具备的态度与能力。

二 作为内在否定契机的方法

在《中国革命与亚洲讨论》一文中,贺照田展演了这一思路。对当今的日、韩与台湾地区的朋友所热衷的“亚洲讨论”,贺照田以一种特殊的、坚定的立场(也就是中国大陆“在地”的立场)游移于区域之间。他是这么申论的:各位关怀亚洲共同体的朋友,我也很乐于看到中国大陆

被纳入亚洲讨论,但是除了表面的、显然的空间与历史关系,以及可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制度谋划外,这个“共同体”还需要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吧!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相互理解作为他者的对方?好比,亚洲朋友如何理解这个一路以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走过来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之间的关系呢?贺照田敦促亚洲朋友们首先要把中国当作一需要被理解的历史他者,就如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要把对方当作一需要被理解的他者一般。但之后,贺照田马上指出如何理解是一关键的功夫,不是礼貌的辞令,而且就此提醒并期待于亚洲朋友。他提醒外头的亚洲朋友,千万不可接受他中国大陆自家的两种历史观,两种有缺陷的认识意识与认识能力,名曰反激进主义思潮的反革命史观,以及相激相荡所产生出来的反反革命史观,前者大约是被所谓的自由派所支持,后者则是所谓的新左派。作者认为这两种明火执仗的史观,最要命的还不是他们的实质内容,而是从这个过程中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认知意识与认知能力的退化:两者尽管针锋相对,但共享一种“直观的、笼统的对历史的解释”。双方都是在自我印证与直接对反,都是在自暴其气,无能守敬持志地“内在于历史脉络定位问题”。如果历史在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状态下被意气消耗,那我们永远也无法从历史中习得教训、获得能量。那该如何做呢?作者提出以人为本,从那些内在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人的苦恼问题下手,唯有从贴近这样的苦恼的心灵入手,我们才能避开革命为是或革命为非的意气争论,并在内在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找到救赎的讯息(即“原有的建设性品质与能量”),并现实地、积极地、也宿命地依赖这些好歹内在于我们的能量与资源,“发展、转化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然,我们何所依?根据作者,它们是历史实践中所展现的“理想主义及对民族、国家、时代具强烈责任感的精神能量”。

是这般清醒与现实的眼光让作者告诫中国大陆之外的亚洲朋友,以及中国大陆人:“决心以中国人的逻辑与是非理解中国,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内在于中国把握中国。”因为这些被当下的需求所急促催生出来的解释逻辑并没有能力与心情去注意到那些在解释逻辑圈之外的“困惑

和苦恼”，而这些恰恰是解放今日困局的契机与能量所在，以及中国大陆所能够贡献给亚洲周边朋友的东西。亚洲共同体，因此，除了是一经济、安全、社会的想像，更应是一人文的想像，大家于此一主权格局被打破了的的文化空间中，从共感他者的苦恼中学习超越今日格局的力量与方向。对作者而言，和平共处是一过于消极的计划，因为它只是要保存现在。对贺照田而言，一个知识计划的伦理核心必然包括“真实的内在自我否定契机”的培养，而流行的“与西方接轨”之说，不过是以外在来否定自己；而与之针锋相对的“中国特殊性”论者，又是老大守成，“固执于自己已然状态”（《拒绝成为自己 也拒绝成为他人》）。

三 此方法的方法论特质

贺照田重视的不是结论或立场，而是立论者同时也是行动者困勉前行且回顾的能力。不是理论或是信念给人以救赎，人（至少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状况才是关键。改造（自身的）知识状况是第一优先的问题。这是为何韬晦如贺照田者会反思他所主编的一本刊物《学术思想评论》的知识历程；是为何他对《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会进行不无溢美的知识状况的考察；也是他为何研究殷海光与徐复观这二位先生的晚年思想转折的原因。

尽管贺照田的思维总是不惮其繁地在相对化，但还是有一种认知意识和努力是被贺照田所持续反对的，那就是体系性思考：学者借由一组抽象概念，脱除历史，脱除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封闭性概念空间，对现实与历史仅仅进行模拟与附会。这种思考习惯的结果是以今律古，删除掉过去之中不为概念之网所过滤的精华，这使得古无法为今用，因为古已成为今的糟粕了。这种阳刚的、推土机式的知识状况其实经常是为当今的霸权所用，形成有利于既存现实的“史观”，因而可说是意识形态的史学。相对于此，贺照田的知识进路可说是一种阴性的史学，或更广而言，认知方式与态度。他重视的不是为当代喧嚣所指的那浮出的冰山，

而是潜藏在那可指可见的“有”之后的那个不可指的“无”的基底部分。这个基底部分是黑暗的(或“不透明的”)、复杂的、缠绕的,但更是思想与价值的丰富资源与能量所在。我们对这个部分不能仗恃概念之武,而更要凭借感觉,感觉到那过去的足声人语、叹息与困顿。重新理解那些思想与行动的生态背景枝节机丫,从它们的萌芽开始掌握它们的变化轨迹。相对于那系统性的考察,这是“境况性”的考察。唯有透过这样的知识方式,我们才能开展我们今天对现实的讨论的“复杂性”与“现实感”。对过去的简单化与童叟化与对今天的简单化与童叟化是相生相成的。因此,不论是出于理论体系的考量,或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或是驱使于当下现实的考量,而进入于历史,都是要被检讨的(《以保守为建设,以被动为主动》)。

这种对于过去的某种虔敬,使贺照田非常不能苟同后学那种对历史的轻薄,表面阴性的后学其实阳性得很,操弄范畴,空洞过去。对此,贺照田要求一种“对史实忠诚性的史学”。这并不是史学的实证主义,而恰恰是要避免概念与方法论的斧钺,以感觉为海绵、为绒毛“被动的”吸纳、缠绕、扭结历史的资源,成为前进与成长的依托。这是一种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的史学进路。用贺照田的话,就是“在保守与建设,被动与主动,惰性与创造[之间]的有机辩证”。对知识对象必须有一优先于认知主体的尊重;感觉必须优位于理性主义认知。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贺照田叹息于:

就我的知识视野而论,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代中国知识界那样,其思想和精神活动那么依赖抽象语词和知识表述。我也不能想像当今世界还有一个民族会像当代中国那样,感受力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中如此地缺少位置和不被尊敬。
(《在困惑中博求 在不安中承担》)

这样的知识界,尽管(其实更是因为)深度依赖理论,但其实只是在意淫现实与历史,不停地在玩以“新一轮的伪科学来覆盖上一轮的伪科

学”这样的一种游戏(见《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但这不可误解贺照田有理论厌食症,他事实上同样批评那些否弃理论的经验主义者或“惰性实证研究”。贺照田要的是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深入与缠绕的关系,这,他称为“扭结”,但扭结的双方并不是同等的,理论是次位的,“内在于历史与理论的真问题”才是知识活动的始发地带。是历史现实扭结着理论,而非理论挟持着历史现实。

因此,一种阴性的知识意识与实践,以其缠绕、吸附与貌似被动,反而吊诡地成为和现实与接为媾最绵密最情色升华的书写。这一点,在贺照田自己对《学术思想评论》这本杂志的评价与理解上颇露端倪。他说:“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缺少理由支持的理解,就是认为和时代纠缠最深的杂志,应该是一个弱性格编辑办的……弱性格……是指性格上的被动性和骨子里的忧郁气质。”这话对了一半,重要的应该还是摆回知识者对理解现实与历史所由经的最弱但也最强的方法之路吧!

四 为己之学与社会整合

若是以终极关怀而言,说贺照田是一自由主义者也无不可——如果自由主义的激进理想还包括自我的不断提升、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超越的话。但是贺照田超越那些简单的自由主义伦理辞令家之所在,就在于他讲求方法,讲求无止境的对自身认知意识与认知努力的超越的方法。一般说来,这个努力表现在一个人不断地对已经存在的对现实的解释的相对化的企图与努力;不断地对抗现实中的那想当然的但同时常常是“非理性”的部分。

这于是牵扯到一重要问题。从知识的开展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道德的生活吗?还是说,我们得先依赖宗教或形上学确立一个道德的主体,再开展相应知识?这些是贺照田所谓的“根本性思考”。透过对徐复观先生晚年思想流变的考察,贺照田借由徐复观提出了他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一没有形上学与宗教作为正当化的

世界,是一个“平铺的人文世界”。人的自我以及知识以及道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此世中,生活地、现实地、困勉地求知与提升自己。这是所谓的“为己之学”,而这般地为己则必定要透过与他者的相处、学习与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或他者不是自我的地狱,于是进入社会、承担社会不是包袱,反而是自我开展的契机。在此,“根本不存在道德之我、认识之我、行为之我打成几截的问题”。

但这样的—个理想的、平实的人文世界却被各种当代形上学与神学或准神学(例如新自由主义市场神学、各种远大目的论、各种压迫性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把意义的日常追寻敏感给麻木化,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给市场体制,或给各种群众煽动家大谈所谓传统价值或民族本有,或“终极关怀”。贺照田有志于解放被压抑与扭曲的这属于人的意义追寻活动,并期望这种努力有助于现实的提升。这里有一道德的、美学的热望,一种对于安顿人生、安顿人心的盼望,以及对于“充实而有光辉”的人间世的憧憬。这已难以说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追求!

在贺照田的缠绕的思维与文字中,不时明灭隐现的幽微的希望之火,是让读的人所最为感动的。但是,据我看来,这样一个反形上学、反宗教的“为己之学”却与宗教的世界仅仅有一发之隔,因为它和宗教的主体要求一样,要求信念的主体、承担的主体;它和宗教的个体目标也类,要求安顿人生与心灵;它和宗教的社会目标也相类,要求社会整合。但它和宗教毕竟有那关键的一发之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即是在除了主体的自我惕厉、反身而诚这一主敬功夫外,别无依托,别无法门,别无终极保证。

但也是在这—点上,贺照田可能得面临他对徐复观先生的重新解释孔子而得的“为己之学”的临界选择。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为己之学,好归好,但毕竟是“君子之学”,只有知识分子有需要,有闲暇,有能力,并不惮于经由对认知态度与能力的不断精进,不间断地否定与提升自我。所谓的“一般人”当然也有认知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以之生活、以之安顿自我,但这大多是在—种意识不强的状态下为之,而且无法承受过重,过重即为奢侈。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仍有君子小人之辨,但贺照田

也许需要交待这一现实问题。如果,一般为生活所迫的人(即非学院精英)现实上并没有办法涵养于为己之学里,那么,为己之学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无法成为一个较普遍性的“社会统合原理”,而这正是贺照田所念兹在兹的一大关心;第二,如果“一般人”丢弃了宗教或素朴形上学,或在此,丢掉了“普世价值”的尺度,却又无法进入“为己之学”,那是否会“民斯滥矣”呢?是否会成为法西斯、极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传统至上主义……的群众擅动家的操作对象呢?经由一些本有的素朴的文化与历史要素对人民进行操弄呢?这也难怪贺照田在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对那些假借依傍历史内在的“传统主义”者的警惕,远远超过对启蒙普世价值的宣道者的批评(《亚洲视角:中国的包袱?还是中国的契机?》)。对于启蒙以来的普世价值,贺照田承认那是理想性的承载,他并没有要否定它,只是要求这些“外铄”一定不能只是“外铄”,而必须要找到与有机之内因的结合,如沙之找到蚌,才能产生“充实而有光辉”的结果。

五 方法作为严厉的裁判并引领知识与论争品格

这本集子里大多数的文章批判性极强,但不是传统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路。贺照田批判的特质是尽量避免对单一立场的批判,而是对争论双方或各方的批判。如果不是贺照田那么苦心孤诣地体贴到每一方的内在与感受的话,这种批判姿势一定会落到不是高傲就是油滑。贺照田诚恳地经由演练其所信服的方法,并以此方法作为法度,对争论进行裁判。因此,这样的一种批判就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要求知识境界的提升。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贺照田的思想表现了一种特定的过程性的普世主义。

好比在《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一文中,贺照田批评了前几年颇热闹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但与其说他是在介入这个论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还不如说他是透过对这个争论过

程的认知与心情(即堂而皇之的论述后头那些被历史影响的无法言明但在情绪上、欲望上占支配性位置的力量),以及国家论述的包抄,在这些之上作考察,发掘幽暗,言其未明。因此,表面上是对这两造的批评,但实际上贺照田的指月之手的所指是知识活动的深层自主性。

贺照田对自由主义爱之深、责之切,因此,把自由主义放在被告首席。他认为,和一般理解不同,这场争论是可以没有的。而毕竟发生了,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品格不足的缘故。自由主义者被现实的危机或挫折所太直接策动,没有深切自省自身的笼统批判(例如反激进主义)的后果,太被政治正确的虚荣姿态所吸引,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直面自身的历史可能性,因而只是“心情自由主义”,如风中之苇,动静皆有所待。是这样的格局的自由主义误认误指“新左派”的有效诉求为敌。自由主义的历史品格也不足,它反思激进主义的影响,但却只是透过评价翻转(即非其所是),而没有将这样一本属于历史的议题摆回到历史中考察。因此,自由主义在需要有历史感才能有效发言时“漏掉了历史本身”。同样,这样一种缺乏历史与现实感的论争,也反映在新左派上头,例如他们,如贺照田所言,在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评的直观引用时,“漏掉了中国现实本身”。

因此,对贺照田而言,谈啥论争的胜负?还早呢!中国知识界要面对的还是在最基本的学术品格的建立——在知识与伦理上建立“有效的批判传统、批判立足点”。而在这个争论中,双方的知识品相都不良,争论都是基于意气的散沙之上。贺照田因此提出了包括重新认识“理论的不透明性”、“事实的不透明性”等基本认知态度与能力的培养。期望在广义的方法上建立起更坚实广大、更有肺活量的知识场域,对求知与论争皆然。在这个共享场域中,进入者不携带体系性理论以自骄自人,在论争中,既然理论与事实都不是自明的,那对手也不是卡通化的简单自明。论争者都是求知社群的一分子,都应对“世界深存敬畏”,对“思想的后果心存敬畏”,谦逊地努力于“更稳妥地提供知识与思想”。

这是贺照田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未来的期望。对这样一个了然于方法、主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缠绕纠结的思想者,我也有一个期望,期

望早日看到在这样的自觉的方法藤蔓之间,早日结成历史洞见之果,让我们更具体、更了然地感受到这个思路的孕育力量,在感动中,说:的确是要有这样的方法,才能有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洞见啊!

贺照田先生,用台湾流行的话,是一个六年级末班生,青春正盛,让我们一起期待着!

赵 刚

2005 年 11 月 5 日

序二

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

——序贺照田先生的《当代中国的
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诗人艾青在抗战初期创作的《诗与时代》中这样真诚坚决地表达了对自己的期许。当诗人的心能够与人民共悲欢、同憎爱之时，发而为歌诗，便是时代的和民众的心声。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当他以朴素、自由的语言来传达关于现实深刻的洞察之际，在诗与时代、语言与现实、诗人与人民之间，便达成了一种感通无间的关系。诗所以能动人，因为诗人与万物同体。

在名实人我之间连带感通的境界，儒家称之为“仁”，佛家称之为“悲”。它不仅是一种理想人格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对语言、观念和知识品格的理想化想像。像艾青那样能感通而非仅能表现的诗人，或可谓是现代的一位大悲盈怀的仁者。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现时代，在诗的语言之外，我们是否还能拥有一种感通的知识？在诗人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具备一种感通的人格？同样的，“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发而为一种关心时代与人民的知识？

贺照田在思考当代知识状况时，反复致意、念兹在兹，且让他焦灼不安的，或许便是这个问题。

多年以前,在电话里,贺照田曾给我讲述了一个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故事。这位战士在被捕之后,十分恐惧,他怕自己经受不住纳粹的严刑拷打,招供出自己的同志。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当他进入牢房看到一扇未加封的窗户时,顿时轻松了。于是,便跳了下去。据说,这是萨特一个剧本里的情节。故事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故事带给我的震撼,却时至今日无法消减。它让我明白,人性的弱点以及由这种人性之弱带来的苦难,远不是高调的道德宣示所能触及并能帮人解脱的。贺照田讲这个故事的意图在于告诉我,知识是要去承受这种弱和这种苦的,而人性之苦弱所期待所需要的,也是一种能够进入苦弱、承受苦弱,并从人性内部帮助人改善苦弱的知识。

对这样一种“软心肠”的知识品质的强调,背后呼应着的是一种敏感、紧张、充满困惑和焦虑的心灵。贺照田把这样的心灵状态及其在性格上的反应,即被动性和骨子里的忧郁气质,称之为弱性格。弱性格的人,兼有体察者和承受者的特性,更易积郁困惑和焦虑。实际上我们发现,体察和承受的兼具,是状况中的认知不可缺的两面,而困惑和焦虑却是敏感于意义差别并产生认知的前提。这是一种带着体温的知识,一种由情感指引的认知和介入。焦虑和苦恼似乎是贺照田的基本生存情态,不过,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他的焦虑总是来自于对他人焦虑的敏感,他自己的苦恼同时又使他能够细心体察到别人的苦恼。贺照田的世界是如此精微,他似乎能够敏感到这个世界的哪怕一个细小的痛苦,而因此,他的世界又是如此的广大,似乎又装得下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痛苦。焦虑和苦恼在贺照田那里,不是拘囿主体的藩篱,而是进入他者、生成意义的孔道,经由焦虑和苦恼,主体在与他者的连带感通中成长为更高的生活世界的主体。

因此,在贺照田的思想世界里,焦虑和苦恼至少具有着两个向度的

正面意义。首先,当焦虑和苦恼感通呼应着他人的焦虑与苦恼时,焦虑和苦恼便超越了认识者的范围,而进入了感知对象的状况。对他人苦恼的体察越深切,意味着对他人所处状况的限制性条件认识越清晰。这种对于状况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其实正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所在。不过,这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并非一种冷酷的旁观者的挑剔实证。在这里,焦虑和苦恼具有着旁观者的“实证”不可比拟的认知揭示力。正是这种由焦虑和苦恼的精神性感通所开辟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基本品格。史学是一种随物赋形的知识。“随物”且“赋形”的史学,既不同于那种仅客观冷静地追随历史事物而并不能在历史整体中赋予其意义的“实证史学”,也不同于那种独断地以原则和教条刚性地裁判世界、只知以目的论来安排意义的“赋形”的“形而上学”。关于贺照田再三致意的史学知识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优越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价值承担方式才担当得起历史之重负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焦虑和苦恼的另一个向度的正面意义,即精神性的存在情态是如何可能开展出一种恰当地承担起价值的知识形态来的。以往关于史学与形而上学两种知识形态对立关系的认知中,关于史学知识的犹疑,主要是对于一种追随历史情境的客观性认知,是否能够既保证价值不随历史情境的具体性和流动性而被相对化,同时又能解决客观的历史认识如何产生价值的价值根源性问题这样双重的犹疑。形而上学和宗教是以目的论形态的知识,通过回避历史性问题,而同时解决了价值的根源性和确定性问题的。在那里,价值的超越性是一种超越历史性情境的普遍性,是一种“说一不二”的刚硬的“主义”。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眼光里,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价值的犹疑状态,它们既可能是对价值如何在历史性情境中落实的焦虑,也可能是对历史总是难以依循价值的引导而盲目任意的苦恼。因此,焦虑和苦恼无疑是一种历史与虚无之间的生存情态,价值还尚且无处寄身安顿。

不过,由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目的论性格,在现时代里其实并不能解决实践价值的动力来源以及价值的根源性和确定性的循环论证问题。他们也可能忽视了“焦虑和苦恼”不过是对抽象的价值确定性原则与非

目的论的历史世界之间的裂痕难以弥缝的焦虑和苦恼,“焦虑和苦恼”既可能是由道德脆弱性引起的焦虑和苦恼,也可能是对道德在历史情境中的脆弱可能性的焦虑和苦恼。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道德脆弱性的苦恼和焦虑,难道不是由某种更具形式性同时也更具历史性的“道德感”引发的吗?当焦虑和苦恼成为进入别人焦虑和苦恼的感通孔道之际,焦虑和苦恼同时便赢得了一种道德的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不麻木地感通正是价值发生的根源。儒家正是把“仁”规定为一种不麻木的感通,而佛教则把“以他为自”唤作“悲”。在贺照田所强调的史学知识的认知结构里,因为容纳进了焦虑和苦恼这样的生存性的精神情态,所以历史认识的延展很自然地通过焦虑和苦恼的环节而成为意义生成的过程,在意义的生成中主体和主体之间发生了一体相应的感通连带,而道德和价值正是在这种感通一体当中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的。与此同时,历史也在这种意义的感通连带之中被组建为更大的主体的历史。历史认识当然承担起了价值,而这种由历史认识所承担的价值当然试图去负担整个历史世界,因为,它总是在历史中努力通过主体之间的连带来能动地与命运搏求,以对历史的客观性认识来增加掌控命运的力量;在一系列因袭着过往势力的历史瞬间,以对历史的整体的客观认识,和对主体精神创造潜力的了解,去把握开放向未来的可能性契机。

因此,在贺照田的知识图景中,史学无疑具有一种类似“本尊”的地位。一方面,恰切的历史认识是人主动地在历史文化生活世界中“配合着自己生命和生活的自然展开,去成就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主体”的条件,同时,恰切的历史认识也是通过对“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和个体生命所处现实”的“充分意识、用力”,从而在“具体历史现实脉络里全面有效地承担起认知的责任”以及实践责任的条件。另一方面,史学作为一种意义生成和价值承担的方式,也展示了一条在中国当下历史现实中人文价值建设的方式,同时也是在当下历史现实中重建人文知识思想的必要环节。总之,在贺照田看来,史学作为认识历史现实,反思和打量自身问题,从而发现消化克服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可推卸地成为进而建设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知识准备。